

結構與資訊行爲：臺灣越南配偶研究

Structuration and Information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Vietnamese Brides

葉乃靜

Nei-Ching Yeh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hih-Hsin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近年來，臺灣男性與東南亞婦女結婚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然而，這些外籍配偶和她們的婚姻卻沒有被公平的對待，她們常被媒體描述為貧窮、教育程度低、為金錢出賣愛情的一群。這樣的現象引起作者的好奇與關心，並認為其實外籍配偶在臺灣這個她們不熟悉的環境中學習適應的過程是辛苦的，是需要被幫助的，我們應該關心的是她們如何尋求幫忙及引發的資訊行為為何？從中找出資訊服務所能著力的點，幫助她們早日融入臺灣社會，這樣對臺灣社會不論是人力面或物質面的生產而言才有助益。這也形成本研究的動機。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設計，以深度訪談法蒐集研究資料，受訪者均為越南婦女，研究期間為2004年8月至2005年7月，受訪者計二十三位。本研究以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為概念架構，理論中的概念如規則、資源、權力等，為本研究資料分析提供了指引。本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很少尋求幫助或資訊，也就是說其資訊行為是非常貧瘠的，紀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可以用來解釋這樣的現象。文末並將結果與Chatman的研究結果相比較，但聚焦在圓周生活理論和資訊貧窮理論。最後，本文強調傳統和宿命論對人們資訊行為的重要影響。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Taiwanese man marrying Southeast Asian women began to take form and thrive. Most of the men are low social status and have limited time for socialization. This condition has made them unattractive grooms for Taiwanese women. Foreign brides, on the other hand, explain their presence in Taiwan as a result of unstabl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at home. The foreign brides are treated unequally, and so are their children. The foreign brides need help adapting to the new life in a unfamiliar environment. This is the reason that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In-depth interviews are used to collect empirical data. The interviewees are Vietnamese women. The research period was from August 2004 to July 2005. In total, twenty-thre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arried out following a question guide made for the study. The interview time is about one hour. The empirical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a hermeneutical analysis technique without computer-based support. Some concepts of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such as rule, resources, power, and information behavior guide the early stages of analysi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foreign brides seldom seek help or information.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is used to explain this condition, and to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at of Chatman's, which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life in the round and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poor. Finally,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concepts of tradition and fatalism on people's information behavior.

[關鍵字 Keywords]

資訊行為；紀登斯；結構化理論；外籍配偶；圓周生活理論；資訊貧窮理論

Information Behavior; Giddens;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Foreign Bride; the theory of life in the round;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poor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臺灣成為東南亞鄰近國家中，經濟較印度、越南、菲律賓和泰國優越的國家。1987年以後，臺灣加速了對外的投資，同時，來自農業經濟關稅協議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群外出等

威脅的阻礙，使數以萬計的臺灣農民和工人階級失去工作，也找不到合適的結婚對象。因此，在婚姻仲介者的帶領下，臺灣男性與東南亞婦女結婚成了一種普遍現象（Hsia, 2004, pp. 188-189）。例如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截至2006年10月底止，臺灣境內外籍配偶的人數計379,859人，其中以大陸配偶人數最多計246,699人，佔64.94%；其次依序為越南籍配偶75,106人，佔19.77%；印尼籍配偶25,894人，佔6.82%；泰國籍配偶9,521人，佔2.51%；菲律賓籍、柬埔寨籍、日本籍、韓籍、其他國家等。（內政部戶政司戶籍人口統計月報 <http://www.ris.gov.tw/ch4/static/st1-0.html> 2006/12/5）

這些男性大部分都是來自社會底層，他們的社會化程度有限，這種情況使他們無法吸引臺灣女性。其他因素尚有：年齡、離婚且有子女等家庭狀況、身心障礙、工作忙碌缺乏交友時間等。臺灣男性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下，許多跨國婚姻是為傳宗接代而來，並將外籍配偶矮化為延續子嗣的工具，或是賦予照顧高堂、幫忙生意等期待。楊艾俐（2003）分析指出臺灣女性近年向上流動機會較男性高，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臺灣女性受過高等教育的每千人中有55.8人，高於男性的52.5人，接近美國、紐西蘭等已開發國家比例。近年來臺灣服務業發達，女性在都市容易找到服務業工作，不願留在鄉間務農或三代同堂伺候公婆。加上臺灣男性若無法接受配偶學歷和收入較自己來得高的情況，就會興起尋找外籍配偶的念頭。

另一方面，這些外籍配偶們家鄉經濟和政治不穩定的情況，被視為是她們願意遠嫁臺灣的原因。此外，也可能因為不當期待（臺灣男性愛老婆）、朋友或親人嫁臺、在自己國度內也沒有找到婚配對象等，遠離家鄉，希望透過婚姻找到新生活出口。這樣的跨國婚姻被視為是買賣婚姻，加上多數外籍配偶的低教育程度，導致她們及她們的子女被不公平的對待（Hsia, 2004, p. 188）。例如在媒體上，外籍配偶經常被刻劃成出身自貧窮家庭、未受教育、不如其他人，而她們的丈夫則被視為是在社交上不受歡迎者，所以無法娶到臺灣新娘。她們的婚姻多被媒體描述為商業婚姻，是社會問題的來源。雖說，這種被視為是貿易功能之下的婚姻之想法是種刻板印象，然而，外籍配偶被視為是問題的製造者，她們的下一代在學校中，因為媽媽是外籍配偶而遭受其他小孩嘲笑，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這可以由世新大學民意調查中心在2003年10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看出。這項調查顯示，臺灣有近六成受訪民眾認為應限制女性配偶來臺人數、兩成民眾認為不應該公平對待女性新移民、受訪者最擔心東南亞

籍女性配偶下一代教育問題、三成五受訪的未婚女性對迎娶東南亞籍或大陸女性的臺灣男性，抱持負面觀感。這樣的調查結果，可以顯示臺灣民眾對外籍配偶並不是那麼的友善（陳慧屏，2003）。

其實，對於這一代的新移民—外籍配偶，在臺灣未來將邁向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趨勢下，她們可能成為孕育臺灣下一代重要的一群，不論是巨觀的由全球化、國家、社會的角度（全球化人口流動的自然狀況、新一代臺灣之子的孕育者），或由微觀的家庭、個人的角度（人生而平等），我們都應該予以關注和協助。外籍配偶帶給臺灣社會多元文化新挑戰，多元文化是文明茁壯的根源和創造力的來源，若要建立多元文化價值的國家，對於這群人我們應以了解、包容取代排斥。上述的種種原因引發作者了解外籍配偶資訊行為的動機。

有關外籍配偶的探討，目前累積的研究成果以巨觀的審視跨國化婚姻的原因，及為社會帶來的問題居多。本研究目的有別於此，希望由微觀的角度探討外籍配偶在臺灣社會面臨問題情境時，解決問題的方式。細部而言，希望了解以下問題：

- 一、外籍配偶進入臺灣社會時，透過那些方式適應家庭和社會生活？資訊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 二、外籍配偶在臺灣社會面臨那些問題情境？透過那些方式解決問題？資訊發揮的功能是什麼？
- 三、外籍配偶利用資訊服務機構（包括政府機構）提供的資訊，協助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情形為何？

藉由上述三項問題的探討，找出外籍配偶面對問題情境時，產生的資訊需求、資訊取得的管道，以建構其日常生活資訊行為的概況。期望這樣的結果，有助於提供政府單位或資訊服務機構，設計針對外籍配偶的服務計畫之參考。

貳、外籍配偶在臺灣的問題情境及可獲得資源狀況

若我們由當外籍配偶踏入臺灣土地後一連串的生活情境來思考，可以想像她們可能面臨的問題情境有下列幾點：

- 一、居留、入出境簽證的規定。
- 二、生活適應：家庭婚姻生活及融入社會（取得社區群己的認同）、語言文字隔閡、文化差異、風俗習慣不同等。
- 三、子女教養。

四、工作尋找：協助改善夫家經濟問題，在未取得身份證前以「外籍勞工」的身分找工作。

五、社會歧視：臺灣社會對外籍配偶的排斥和污名化。

對外籍配偶而言，若她們要成功的再社會化，須要先克服語言、文字、文化、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等的差異。識字是學習和獲取資訊的先決條件，也是邁向再社會化的第一步。如此一來才能主動尋求社會機構協助或爭取權利，而不是被動的靜待他人或政府的協助；也能與他人互動溝通建立生活網絡，提供精神或實質上的支持，或分享心情和經驗。

那麼，現階段臺灣社會提供外籍配偶那些協助呢？我們可以分幾部分來看：

一、網站資訊。

二、政府機構開設的識字班、生活適應班和專業技術養成班。

三、民間機構如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臺北市永樂婦女中心、財團法人臺北市賽珍珠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臺南縣外籍聯姻家庭發展協會、外籍配偶關懷協會、南洋臺灣姊妹會、婦女救援基金會等，舉辦相關的講座、提供外籍配偶母語語言諮詢專線、志工培訓等。

四、針對外籍配偶家人及從事外籍配偶直接服務者，開設越南語等學習課程。

五、社區大學開辦外籍配偶成長團體或學習課程、志工培訓課程。

六、廣播電台提供母國語言節目：例如臺北電台以印語、越語、菲律賓賓語及泰語製播「HELLO TAIPEI」節目，及其他介紹外籍配偶母國文化節目如「湄南河畔」。教育電台製播以不同東南亞語言播出的東南亞語言教學節目。高雄電台製播外籍配偶在台生活情況報導。

參、紀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除了Howard Rosenbaum（1996）「組織中的管理者和資訊」之研究，紀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很少被應用為理論觀點，解釋人們資訊行為的現象。本研究以這個理論為研究之概念框架的理由為，首先，該理論主要是在解釋人們的行為和結構之間的關係。結構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無形的，對外籍配偶而言，臺灣文化是一種無形結構，是否箝制、規範其資訊行為，是本研究想要了解的。其次，它具有對資訊行為和該行為引發的社會論述提供新洞察力的潛力。我們藉由對結構本質的理解以

及了解結構如何強加在個體上而發揮其影響力，也許可以得到一些關於人們資訊行為的新想法。第三，沒有人可以對權力免疫，就此部份而言，我們可以審視權力對人和對人們資訊行為的衝擊（Joyce, 2005, p. 351）。

在結構化理論中，結構被認為是規則（rule）和資源（resource）相互牽連於社會的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中。結構可以被抽象地概念化為規則的兩個面向：規範的要素（normative elements）和意義的代碼（codes of signification）。另外，資源也有兩種，即權威資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和配置資源（allocative resources）。紀登斯分類了這兩類型資源，他指出，配置資源源於物質產品控制或物質世界的觀點，它包括有：環境（原材料、物質能量）的物質特徵、物質生產、再生產的意義（生產的儀器、科技）、被生產的物品（由前二項相互作用產製出來）；權威資源有：社會時空的組織（temporal-spatial constitution of paths and regions）、身體的生產/再生產（在相互關聯中，組織與人的關係）、生活機會的組織（自我發展和自我表達的機會組成）（Giddens, 1984, p. 258）。

在結構化的理論中，人被描述作為一個行動者（agent），具有行動力（agency）。行動力指的不是人做事的意圖，而是人具有反思性（reflexive）的特徵（Giddens, 1984, p. 9）。反思性不僅是一種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也是一種對持續著進行的生活的監看（monitor）。如同紀登斯所說的，作為一個人就如同作為一個有目的的行動者，她們的行動都是有原因的，並且能詳盡的推論闡述這些原因（Giddens, 1984, p. 3）。

此外，行動者對事物或事件的狀態，及其存在前的狀況有區辨的能力。如果他／她失去這種能力，也就是失去行使某種權力的能力，他／她將不再是位能動者。因此我們可以說，行動在邏輯上包含某種權力，能形成改變的能力。權力本身不是資源，資源是種媒介，透過媒介的運作權力得以展現（Giddens, 1984, pp. 14-15）。

結構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紀登斯以結構二重性（duality）代替結構二元論（dualism）。結構外在於時間與空間，循環地組織著規則和資源。行動者在某一情境下引發的活動，構成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系統，在其中，結構同時扮演限制者和驅動者的角度，此即結構二重性（Giddens, 1984, p. 25）。行動者建構了社會系統，同時也被此系統所束縛。所有的社會系統無論是多崇高或是廣布，在日常社會生活中例行性的表現或被表現，無可避免地都受到人們身體的或知覺感知屬性所中介（Giddens, 1984, p. 36）。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設計，以深度訪談法蒐集受訪者的經驗資料。質性研究法有助於描述外籍配偶的生活世界和她們的資訊行為這個新社會現象。紀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和資訊行為相關理論，為本研究的訪談和資料分析工作提供了指引。

本研究受訪者主要是越南新娘。在臺灣近乎一半的外籍配偶來自中國，而越南新娘是第二大族群。研究者選擇越南新娘的原因是，近幾年越南婦女已經成為臺灣人選擇外籍配偶的重要對象。與來自中國的婦女相較，越南新娘的文化與臺灣差異較大，大部分的越南新娘來臺灣前兩個月會學習中文，但她們無法閱讀漢字也不會說臺語，她們有限的中文語言能力可能阻礙了她們與別人的溝通，也可能限制了她們對資訊的尋求和使用。研究者捨棄最大群外籍配偶人口（來自中國），主要是想看看能否由更大的文化差異中（作者假設大陸配偶在適應臺灣文化上較越南配偶容易），找出外籍配偶的資訊行為特徵，也想了解文化對資訊行為影響的狀況。

本研究期間為2004年8月到2005年7月，計有二十三位受訪者，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間約為一個小時。所有的受訪者皆居住在臺北縣市。受訪者中部份完成小學教育（六年），有些則具有國中學歷（計有九年受教育年限），僅有一位是大學畢業。她們平均居住在臺灣有三年時間。受訪的外籍配偶對於正式的訪談多數感到拘束，因此，研究者以非正式的聊天對話方式蒐集研究資料，希望緩和受訪者緊張的情緒，減少接受訪談的不自在感，而能盡量的表達看法和感受。即便如此，所有的受訪者皆同意研究者將訪談對話錄音，以利後續資料分析進行。

資料分析時採用詮釋分析技巧，以紀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中的概念譬如規則、資源、權力和資訊行為理論為分析的架構。在本研究中，「結構」這個概念被視為是環境或生活世界，及對人們行為產生規範作用的標準或觀念（Schutz & Luckmann, 1973）。根據紀登斯的理論，我們可以將行動者等同於外籍配偶，人是有目的的行動者，行動者知道自己所為及所為何。行動者雖無法自外於結構，但也不全然受到結構所影響。行動者和結構之間沒有那一個優於那一個的問題，是相互作用的，也是在此過程中，再生產結構（Rosenbaum, 1996, p. 185）。

伍、外籍配偶貧瘠的資訊行為

本段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有關外籍配偶生活世界的特徵，在此我們可以發現外籍配偶的資訊行為是貧瘠的；第二部份則利用紀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解釋為何外籍配偶不尋求資訊，以突破結構的限制，成為一個能動者。

一、外籍配偶生活世界的特徵

對這些外籍配偶來說，整理家務和照顧小孩是每天例行的工作。此外，她們的休閒時間多半用於看電視，電視也提供她們學習國語和臺語的功能。她們不常出門，即便很多其他的越南配偶就住在附近。她們不常出門的原因是對環境不熟悉，另一方面則是丈夫及婆婆禁止她們出去，因為擔心她們出去後會被帶壞，例如可能從此後不再那麼聽話或順從；或是她們可能遣款逃回越南。如果她們攜款逃回越南的情況真的發生，對她們的婆家而言將是很大的損失，因為這樁婚姻是建構在金錢基礎上（即男方付了大筆金額給外籍配偶仲介者）。當然，這樣的恐懼也許也源自媒體報導的影響。

對這些外籍配偶而言，在臺灣要面對不同的環境和習俗頗具挑戰性，因此來臺灣的前兩年，適應臺灣的生活是她們主要花費心思的地方。在這段適應期間，丈夫和婆婆是主要協助她們適應臺灣文化的人，雖說政府提供一些生活適應類的課程，但她們並沒有被鼓勵去參與這類課程，其他的中文或臺語學習課程也出現同樣的現象。

另一個隱藏的問題則是她們對家鄉的思念。要克服這樣的問題，其實丈夫和婆婆是唯一的幫手。然而，當她們遇到問題時，她們卻總是屈服於丈夫及婆婆的想法之下，即使這可能違背自己的意願，可以說，她們是沒有自己想法的一群。因此碰到思鄉的問題，如同其他問題一樣，她們只能改變自己的想法，說服自己學會適應新生活，壓抑、忍耐並隨時間淡化鄉愁。

由此，我們可以建構這些外籍配偶生活世界的圖像，她們的生活世界主要由家庭（先生、婆婆和其他家人）、孩子和家事建構成。作者嘗試用以下概念來描述外籍配偶日常生活的特徵，這三個概念分別突顯心理和行為方面的影響力，也是相互影響，例如受訪者的宿命觀讓她們傾向遵循傳統規範，在此作者以這些概念強調受訪者在日常生活上有別於其他族群的地方：

(一)恐懼

「恐懼」是人類基本情感之一，也是一種心理反應，這種反應雖然可以增強保護自己和避免危險的能力，但也使人意識變的狹小，判斷力和理解力降低，展現在行為面就是保守和侷限，面對的刺激和挑戰也相對的少（望春，2001）。

本研究受訪的外籍配偶擔心婚姻破碎而必須返回越南，畢竟在臺灣她們擁有較好的經濟生活，並且有能力金援家鄉的家人。對可能失去婚姻的恐懼讓她們願意聽從丈夫和婆婆的指示行事。例如受訪者W.B.在臺灣三年了，有一個小孩，她表示：

「我朋友嫁到臺灣，她跟我說臺灣的經濟很好，我想如果我嫁到臺灣，我就可以有很多錢可以寄回越南支援我的家人。」

(二)傳統

人類生長於社會象徵社群中，自小在社會規範無形的教導下瞭解該表現何種行為才是合宜的，這些社會規範在每個民族中代代相傳，久之形成了各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份。傳統形塑個人的經驗，在個人知識建構過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說傳統形成個人知識倉儲的部份，也是人們碰到問題或需要知識的情境時，第一個會應用的知識來源（Berger & Luckmann；鄒理民譯，1991）。

在越南文化中，「孝道」觀念和臺灣文化是相似的，從小她們被教導成必須孝順和尊敬父母和長輩，服從丈夫的命令，除了上述恐懼因素外，傳統觀念的影響也是另一個因素。在這兒，由於外籍配偶生活在異國文化中，我們看到傳統孝道觀對她們行為的影響，傳統在個人知識形塑的狀況和應用，在本研究中雖未觸及到，但受訪的外籍配偶曾提及她們在腹痛時自我療法和女性坐月子食療上的傳統知識，與臺灣或中國文化確實完全不同。

(三)宿命論

宿命論（fatalism）源自拉丁文fatum，fatalis原有命運、遭遇、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意思。這個論點認為人的命運受到某些神秘不可知的力量所操控，沒有人可以完全自主的活動。在不同民族的剝削階級都存在宿命論的思想，例如中國古代儒家所說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道家所說的「委天知命」，和歐洲古希臘羅馬斯多葛學派主張的「服從命運」等思想（張尚仁）。

本研究受訪的外籍配偶相信生活是被命運所控制的，所以不會積極地想要改變生活模式，這也是為何她們會服從她們丈夫及婆婆的命令的

另一個理由。例如：受訪者Y.R.居住在臺灣已有九年，有一個兩歲的男孩，她表示：

「我覺得我嫁到臺灣是好是壞都是命運，所以我在嫁過來之前沒有考慮太多。」

多數受訪者覺得沒有受到家人及其他臺灣人的尊重，即便是已經結婚多年的受訪者。事實上，外籍配偶並沒有被她的家人公平地對待，但是對她們而言，好的生活（由經濟面定義）卻比任何事情重要。長期以來的貧窮讓她們懼怕會永遠貧窮，這使得她們有勇氣遠嫁海外，並且接受這種不平等對待的生活，即使這樣的生活可能讓她們失去自我。再者，在臺灣她們是被歧視的一群，因為她們來自經濟落後的國家，並被定義成為了金錢而結婚，以致於她們像是二等公民般的被對待。

二、為什麼外籍配偶的資訊行為如此貧瘠

從上述對外籍配偶日常生活的寫照，我們可以說她們的生活世界不僅狹小而且封閉。家事佔據外籍配偶生活的多數時間，生活和文化適應、養育子女的方式，是她們面對的主要問題情境，也曾有參加政府開設之課程的念頭，卻在家人的反對下無法如願。家人是她們主要資訊來源，這主要彰顯在養育子女方面。電視也許是很多人資訊的來源，但對外籍配偶而言，語言是個障礙，也許看電視有助於學習國語或閩南語，但主要還是娛樂的功能。因此，作者才以「貧瘠」形容外籍配偶的資訊行為。本段試著以紀登斯的結構化理論檢視外籍配偶的資訊行為，也是希望找出外籍配偶的資訊行為之所以貧瘠的原因，而試著用不同於其他研究的理論視角。

紀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中有四個重要的因素，影響行動者是否自由、成功地採取行動。這四個概念是意圖、能力、規則、資源。第一和第二個概念是屬於個人因素，後兩者則是來自結構的影響。規則可以視為是一種規範和意義符碼，它象徵著不同的意義，該象徵意義被所有同屬於某群體的成員所認可，並無形中指引人們的行動，它告知人們什麼該做、可以做和如何去做，但人們通常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無形中被規範著。在Rosenbaum（1996, p. 275）的研究中，就定義規則為可以被用來形塑、維持、終止和再創造在不同的環境和時間內的資訊行為之過程或技術。

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外籍配偶同時受到越南及中國文化的規範，例如對父母和長者的孝順尊敬，及對丈夫命令的服從。尤其是當她們

剛來臺灣時，並不熟悉臺灣的環境，接受家人指示而行動的現象更為明顯。她們沒有因為離開越南家人而變得獨立了，更遑論自由的做自己。當然，對她們而言，擁有好的經濟生活和有能力金援越南的家人是最重要，這個事實說服了她們接受這些不平等的對待。宿命觀讓外籍配偶願意在不平等環境中生活，這成了另一個規範其行為的準則，加上傳統的孝道束縛，這都是紀登斯指出的「規則」對人們行動的限制。因為她們的教育程度較低，我們無法看出女性主義者對女權的主張，諸如女人應該做自己、不要屈服父權制度的霸權等之類的言論，在外籍配偶身上產生作用，紀登斯的「能力」概念正可以說明外籍配偶受到的另一個侷限。

關於資源呢？在紀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中有兩種資源，權威性資源和配置性資源，前者源自行動者的活動，後者源自對物質資源的掌握。Rosenbaum（1996, p. 348）的研究中對資源的定義，是一種在組織的環境中被成員利用來落實資訊行為的社會或物質元素。對外籍配偶來說，這兩種資源都是缺乏的。就配置性資源而言，外籍配偶必須在臺灣居住六年方可取得永有居留權和工作權。沒有工作權的情況下，她們無法藉由賺取金錢取得任何有價物質資源，當然也包括圖書、雜誌等。以資訊這類目前仍多數屬於免費資源的情況下，她們卻因為認知缺乏（不曉得資訊對學習、再成長的功能，缺乏電腦使用技能）和受限的環境，無法取得和利用，唯一能依賴的是家庭資源，卻也非常有限。

那麼，公共圖書館和資訊機構提供的免費資訊資源和服務，被外籍配偶使用的情形又是如何呢？雖然說，在臺灣以越南語印製的書籍非常少，除了兩種政府發行的多國語言手冊外，只有一些非營利機構的零星出版物；再者是臺灣部份非營利機構提供的面對面或電話諮詢服務；另外，臺灣雖有一個以越南語發音的電視頻道提供部份節目，卻都鮮少有受訪者知道。

權威性資源也是同樣的情形，就像以上所提到的，外籍配偶很少離開家門，也少有朋友在臺灣，可以說她們在臺灣認識的人少，也缺少擁有或掌握權威性資源的機會。除了社會網絡薄弱外，無法透過網路在虛擬世界中建構自己的社會資本，她們能掌握的權威性資源更是貧乏了。

可見，外籍配偶可支配應用的資源非常有限，即使她們有積極的突破現狀之動機，又侷限於語言、資訊尋求技巧、及對資源認知和能力的不足（可以說這是源自資訊視域的限制），因此無法體會尋求和利用資訊以解決日常生活問題情境的重要性。這也是她們的資訊尋求和使用行為如此貧瘠的原因。外籍配偶正是在資源、規則和能力的有限框架內，

無法突破結構的限制，而成為一個如紀登斯所言人可以是個能動者，透過資源改變結構狀況，重構自己的生活。外籍配偶的這種現象也反應了紀登斯理論中的結構二重性，規則和紀律的規範與資源的缺乏（結構），與外籍配偶的能動力，是互相作用的。一方面在缺乏資源的前提下，自然的，外籍配偶的能動力是薄弱的。

紀登斯認為，改變結構限制的關鍵在於權力。在這裡我們可以將改變定義為，改善她們被不平等對待的情況。外籍配偶在臺灣就像是二等公民，她們需要打破現有、無形的結構局限，包括社會準則的規範，並成為一個獨立的能動者、行動者。權力產生於結構的控制並能再生產結構（改變現有的結構狀態，如被家人限制的行動、被社會的歧視等），外籍配偶如何獲得權力改變現況，使自己的視野擴展、改進生活的水平？以下，可能是一些解決之道，可以提供政府、基金會，或資訊服務機構參考：

- (一)臺灣政府必須呼籲所有的臺灣人尊重外籍配偶，並且公平的對待她們。臺灣已經變成一個多元化的國家，並發展成為全球性經濟體系下的一環，全球性人口轉移的現象將變的更加普遍。外籍配偶只不過是此現象下的產物，臺灣社會應以常態眼光看待此一現象。況且由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人人生而平等，不應有階級之分，任誰都不願承受階級分別之苦。因此，政府制定保障外籍配偶的社會福利政策，將是無庸置疑的，也是當前迫切之道。
- (二)在外籍配偶獲得公平待遇之前，上述機關或基金會可以例行性的提供，以越南語言編制的任何學習性或資訊性（如有關越南國家訊息）給外籍配偶，鼓勵她們在無法離開家的情況下，盡量利用送到家的免費資源把握學習機會。對於身處異國的外籍配偶而言，能取得、使用母國語言的訊息和文化資源，應該最能慰藉其思鄉之情，也是不可忽略的資源。
- (三)政府和基金會需鼓勵外籍配偶打破她們加諸於自己的傳統規範和限制。例如，她們需要改變宿命論觀點，相信可以藉由努力改變生活狀況。對父母或長者盡孝道，和服從丈夫的命令，不代表她們需要接受不合理的任務要求，和無法自由地獨自行動。
- (四)政府和基金會可以鼓勵外籍配偶多結交朋友。人際關係是重要的情感支柱，不僅可以幫助她們迅速的適應臺灣生活，減低思鄉情緒，也是重要的資訊來源，更可能是學習的對象。

(五)除了為外籍配偶提供紙本資源的服務之外，政府和基金會可以設法說服外籍配偶的家人，讓她們有學習新技能的機會，包括網路資源檢索和尋找的技能，以利未來工作機會的取得。而一旦當她們經濟獨立後，她們的行動也將更加自由。

針對第二點提供越南語資源給外籍配偶部份曾引起社會討論，反對者認為應讓外籍配偶學習國語以早日融入臺灣文化，反對者似乎隱含著擔心外籍配偶挾其文化入侵臺灣、影響下一代語言能力及身心發展的憂慮（吳秀照，2004）。贊成者則認為對外籍配偶的文化其實我們應該要提供保留的空間，對於反對者有關文化入侵的顧慮，他們則提出另類的看法，外籍配偶勢必要學習臺灣本地語言和文化，才能與臺灣社會主流對話，以扭轉外籍母親劣勢地位（唐文慧、王宏仁，2002）。作者持贊成者態度，並認為兩種語言資源的提供並不衝突，因此提出第二點建議。

陸、討論與結論

在了解外籍配偶的日常生活狀況後，本研究對象與Chatman的監獄女受刑人和退休社區老年婦女研究有些相似，同屬社會上較為弱勢的一群。Chatman提出的資訊行為相關的兩個理論「資訊貧窮理論」、「圓周生活理論」，可用於解釋本研究結果（Chatman, 2000）。

Chatman的資訊貧窮理論包含四個概念，即冒險、守秘、欺騙和情境相關。她們被用來了解為什麼局外人不向局內人尋求和分享資訊（Chatman, 1996, p. 193）。本研究對象外籍配偶，可以被視為日常生活和資訊擁有方面屬於貧瘠的一群，如同Chatman（1999, p. 209）所述，生活在一個小世界中的人們，其行為和活動是例行性的並且可預測的，外籍配偶的生活世界正是如此。她們害怕家人生氣而拒絕與他人交談互動的行為特徵，除了反應在交友方面，也反應在接受訪談上（例如對話過程中小心翼翼、似乎有所保留不敢暢所欲言）。對她們而言，接受訪談雖可獲得訪談費但也是一種冒險，可能面對被丈夫或是婆婆責罵的風險。對外籍配偶來說，傳統價值觀的束縛界限、宿命論和社會規範，是情境限制了她們的資訊行為。

圓周生活理論也包含四個概念，即小世界、社會規範、世界觀和社會型態。圓周生活理論的關鍵在於「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特色，「一如往常」的生存形態，讓人們在生活中有種確定感，從中建構日常生活

的意義（Chatman, 1999, p. 207）。外籍配偶的生活模式並不是一種公開的形式，不同於監獄裡的女受刑人，需要向別人隱藏自己。然而，如同監獄中的女受刑人，她們也需要去適應環境。就這點而言，資訊並沒有太大的幫助，資訊對她們而言沒有顯著的意義。

為適應環境，外籍配偶的行為被自我保護的動機所驅使，例如責任感，其意味著照顧丈夫的家庭、做家事、待在家裡，除了到市場買菜。對於環境的不熟悉、有限的國語能力、家庭的限制等，讓外籍配偶在與他人互動中表現出恐懼和不信任。她們好像居住在一個無形的監獄，擔心行動隨時都受到監控。然而，符合無形規範下的生活，反而帶給她們某種程度的安全感，甚至覺得受到保護，而這樣的情形也形塑了她們的行為。因此，她們不會奮力去抵抗被歧視的待遇，當然這也對她們的資訊行為產生負面作用。

圓周生活理論可以用來解釋外籍配偶的資訊行為，她們視現有的生活方式為「理所當然」。她們的行為被社會規範和傳統習俗所束縛，她們卻願意忍受，沒有反思這樣的生活形態，是否符合自己對結婚後新生活的期待。如果我們能考慮傳統對外籍配偶行為的影響，我們對外籍配偶的生活世界，將有更完整的圖像，並且了解為何她們不尋求資訊與幫助。也許我們可以說社會規範建構了一個小世界，生活中小世界中的人們就像生活在一個圓中，被圓周框限住思維和生活。傳統和宿命觀等社會規範也是導致她們貧瘠資訊行為的原因。

最後，這篇文章對於我們了解資訊行為提供了什麼助益呢？本文旨在發掘人們不使用資訊的原因。由本研究結果可以了解資訊並非對每個人都是重要的。此外，作者也試圖找出可以解釋人們資訊行為的新概念。如同Chatman所提醒的，資訊專業中的任何成員都有義務去藉由不斷的努力研究、專業實踐和出版研究成果，以對生活中屬於弱勢的一群的資訊需求找出新議題或是新視角，特別是社會上容易被忽略的族群（Chatman, 1996, p. 205）。由本研究我們發現，「傳統」、「宿命觀」等應該是可用來詮釋人們資訊行為的新概念。

參考文獻

- 吳秀照（2004）。東南亞外籍女性配偶對發展遲緩子女的教養環境與主體經驗初探—從生態系統觀點及相關研究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05，頁159-175。
- 唐文慧、王宏仁（2002）。爸爸的、還是媽媽的母語？勿陷入大臺

- 灣沙文主義的母語教學。（聯合報，2002.6.25，第15版）。檢自：<http://benz.nchu.edu.tw/~hongzen/newspaper/mothertongue.htm> 2004/8/2
- 張尚仁。宿命論。中國大百科智慧藏全書資料庫。上網日期：2007年8月1日，檢自：<http://203.72.198.245/web/Default.htm>
- 望春（2001）。恐懼心理能消除嗎？。上網日期：2007年8月1日，檢自：<http://women.sohu.com/20010606/file/0000,115,100035.html>
- 陳慧屏（2003）。臺灣民眾態度大調查：關起大門還是敞開心胸？**大地地理雜誌**，188，72-79。
- 楊艾俐（2003）。臺灣新臉譜：東南亞配偶—外籍配偶錯嫁臺灣郎？。**天下雜誌**，271，110。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91)。知識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鄒理民譯）。臺北市：巨流。（原著1966年出版）
- Chatman, Elfreda A. (1996). The impoverished life-world of outsid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47(3), 193-206.
- Chatman, Elfreda A. (1999). A theory of life in the roun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50 (3), 207-217.
- Chatman, Elfreda A. (2000). Framing social life in theory and research, *The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1, pp.3-17.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sia, Hsiao-Chuan. (1997). *Selfing and othering in the "foreign bride" phenomenon: A study of class,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between Taiwanese men and Indonesian wome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Florida.
- Hsia, Hsiao-Chuan. (2004).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trade in Asian women: The case of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 In Aguilar, Delia D. and Lacsamana, Anne E. (Eds.), *Women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 Joyce, S. (2005). Symbolic violence, In Fisher, Karen E., Erdelez, Sanda and McKechnie, Lynne. (Eds.), *Theory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New Jersey: Information Today, Inc.
- Rosenbaum, H. (1996). *Managers and information in organizations:*

Towards a structurational concept of the Information Use Environment of managers, Ph.D. diss., Syracuse University.

Schutz, A. & Luckmann, T. (1973).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Richard M. Zaner & H. Tristram Engelhardt, Jr., Tran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